

不容青史盡成灰 ——「抗戰中國 學術座談會」紀 實

鄭巧君 國史館修纂處研究助理

緣起

國史館為迎接 2015 年抗戰勝利 70 週年，展開多項活動，包括學術座談會、系列座談會以及出版專書等。繼去（2012）年已舉辦過的「抗戰史之研究學術座談會」（參閱本期刊第二期），於今（2013）年 5 月 25 日舉辦「抗戰中國學術座談會」，邀請了兩岸學者：張玉法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金沖及教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齊錫生教授（退休教授）、吳景平教授（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黃道炫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從政治、經濟、外交等不同專業領域和角度來進行專題演講，對抗戰史進行討論與再思考，並提出新的觀點與反省。

張玉法「抗戰時期的整體情勢」

張院士認為第二次中日戰爭，對近代中國而言是一個瀕死回生、具絕對性影響的戰爭，理由如下：1. 總結自鴉片戰爭以來九十多年反帝國主義戰爭，集合全國的人力物力，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一場保全國家領土、爭取民族獨立的國際戰爭，贏得最後勝利。2. 第二次中日戰爭後結合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與英、美、法、蘇聯等世界強國站在同一戰線，共同抵抗德、日、義，改變中國次殖民地的地位，躍升為世界五強。3. 中國歷史上不曾有過如此龐大人力物力的動

員，自辛亥革命成功後所形成的中華民族，在此有了真正團結的一個機會，中國國民黨雖未能善用此一機會統一中國，但把帝國主義國家趕出中國，國家的力量因此得到鞏固，也提升了民族的氣勢，奠定之後國家發展的基礎。

就中國戰場而論，正面戰場的研究頗為豐富，但往往偏重於研究中方或日方，若將兩方合而觀之，就雙方武器、運補、戰術、戰略、決策等方面加以比較，方能了解戰爭的全貌，如能進一步探索戰地人民與戰爭的關係，更有意義。又及，敵後戰場比正面戰場來得複雜，它涉及國、共、日、偽四種勢力的合縱連橫，不僅是中日對抗，還是國共權力競逐，更涉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對抗，故不能單以「漢奸」、「賣國」等民族史觀來處理。大後方問題也不單純，應以重慶、昆明、延安、迪化四個政治勢力為中心加以討論，重慶的國民政府自認為是中央，延安的中共以抗日為名與中央合作，實際尋找發展機會；迪化的盛世才試圖與蘇聯連繫，希望保持自身的獨立性；昆明的龍雲與延安暗通款曲，私下支持第三勢力。因此四地均以抗日為目標，對抗日大局雖有傷害，但影響不大，影響較大的是延安在心理上並不認同重慶政府。蔣介石在戰前所堅持的「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雖是正確的，但人民無所選擇，故誰能代表他們的利益就跟著誰走，這是敵後跟著延安走的人民愈來愈多之因，在中日開戰前，共軍不過三萬人，幾

有滅亡之勢，但戰後共軍武裝部隊卻擴充至百萬人。

至於淪陷區的景象和大後方完全不同。淪陷區的人民可加入汪政權的軍隊，掃蕩國共游擊隊，但不會幫助日本侵略中國。第二，淪陷區的百姓是向汪政權納稅，不是向日本納稅，而且汪政權的訂立的稅率比重慶政府低。在張院士的印象裡，淪陷區的人民過得較好，國民黨來了之後生活開始變壞，而共產黨來了就變得不能生活了。

張院士最後強調，游擊隊雖對抗日戰爭很有貢獻，但對一般百姓而言，則是不堪其擾。因為在抗戰時期，游擊隊占領了部分淪陷區的鄉村地方，淪陷區的民眾不僅受日軍的欺壓，還要受游擊隊的騷擾，抗戰勝利後又受來自大後方的民眾的歧視，甚至被視為漢奸。當政府無法抵抗外患時，將人民遺留在淪陷區，已不能再保護他們，因此淪陷區的人民有求生的權利。國民政府未能意識到這點，在戰爭勝利後與共產黨競爭淪陷區時落敗，才使共產黨有機會與國民黨爭天下。撇開國共兩黨勢力消長不談，抗日戰爭使中華民族比以前更團結，不僅提振民族精神，也使邊疆地區對中央的向心力較先前增強。

金冲及「抗戰時期的國共關係」

金教授提到，國共兩黨曾兩度合作、亦兩次破局，最長的合作時間是在八年抗日戰爭時期。兩次合作的條件並不相同，第二次

國共合作的特點如下：1.在中日衝突最高時形成。民族敵人深入國土，中華民族已處於生死關頭，為了要降低國內政黨矛盾，國共兩黨便決定此次長期合作。2.在國共兩黨經歷了十年內戰後重新攜手合作。中國共產黨分別在 1927 年和 1934 年接近毀滅的邊緣，此種不安全感難以在短期內被消除。國民黨在抗日的同時不斷找機會限制、削弱甚至消滅共產黨，共產黨也時刻戒備國民黨，因而增添此次合作的複雜性。3.在國共雙方都有各自的政權及武力的情況下合作。抗戰時，國民黨擁有全國性的政權和強大的軍隊，處於優勢地位，因此國共合作的立基並不平等。但共產黨本身也有政權和軍隊，並且在敵後有較好的發展，因此之故，國民黨當局力加限制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政權，共產黨則盡力反限制，直到戰後的政治協商會議時仍是如此。4.在國際間逐步形成並展開反法西斯戰爭的背景下執行。中國的抗日戰爭成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作為盟友的美英和蘇聯的態度，都對中國國內的局勢（包括國共關係）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有兩個關鍵因素：1935 年的華北事變以及 1936 年的西安事變。華北事變展現出日本佔領東北四省後要割裂華北的野心，日本外相廣田提出「廣田三原則」之後，接著日方又以最後通牒的方式限期要求華北地方當局宣布「華北自治」，此事超出了蔣介石所能容忍的底線。西安事變對蔣介石的影響至少有兩點：一是

蔣經過福建事變、兩廣事變之後，又發生手段激烈的西安事變，使蔣瞭解到不只全國大多數民眾強烈要求抗日，軍隊中同樣也充斥著此種幾近忍無可忍的情緒。二是蔣理解到中共的軍事力量雖然較弱，但卻無法將其消滅，而周恩來與蔣介石的面談則使蔣多少感受到中共的誠意。以上兩項因素使蔣終於下定決心與共黨合作，儘管此後尚有許多障礙和波折，但終於形成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的新局面。

抗日戰爭後期的國共關係中，金教授認為有兩件事值得注意：1.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於 1943 年出現走向勝利的轉折，共產國際宣布解散。蔣介石曾密令重兵駐守西北的胡宗南部隊準備進攻中共中央政權所在的陝甘寧邊區，企圖解散中國共產黨。然而因為共產黨已有所準備，再加上國民黨擔心失去國際和國內的支持，因此最後沒有行動。2. 1944 年 4 月間開始的豫湘桂大潰退。中國軍隊在緬北艱苦作戰並取得勝利，但中國戰場上卻出現震動全國的大潰退，大後方的人心受到巨大而強烈的刺激，對國民黨當局的看法產生重大變化，此事件的影響一直持續到戰後國共關係的演變，抗日戰爭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中迎接勝利的到來。

齊錫生「抗戰時期的外交」

齊教授認為研究外交史，必須注意到資料、觀點、格局及角度，而研究抗戰時期

的外交，還要注意外交的雙邊關係、多邊關係、外交與內政及軍事間的關係，以及戰爭對外交帶來的影響。

在外交的雙邊關係方面，必須放大視角，原因在於外交是非常高度的互動，唯有深入了解雙方的互動，才能透徹地了解、梳理清楚本國的外交關係。例如，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任中國戰區參謀長期間，絕大部分的時間是待在印度或緬甸，其與英國人打交道的時間遠多於與中國人相處，而他與英國人來往的經驗，又影響到他對中國人的態度，以及對軍隊改革、戰略、戰術的想法，並間接影響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國務卿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在華盛頓制定對華政策。因此若能充分掌握史迪威在印度、緬甸戰場與英國人的互動，將有助於提昇理解中美外交的關係。

就外交的多邊關係而言，如抗戰初期蘇聯提供中國武器，後因蘇聯在歐洲承受了壓力、其後又與日本改善關係，因此轉變了蘇中互動，迫使中國在對美的外交上做了調整。另外，日本採和戰交叉運用的攻勢，也會影響中國對歐美國家的策略。在此情形下，即使是敵對的雙方，仍有些外交空間，甚至間接影響彼此對其他國家的外交問題。所以將外交議題視為多邊關係，有助於拓展研究視野。

某種程度上，中華民國政府所呈現出來的外交關係，其實是內政問題的投射，此處

的內政是指地方勢力的問題。此外，外交與軍事之間的連動也值得注意，例如蔣介石堅持八一三淞滬開戰，即是為了將戰火引進租界區、藉此誘發美、英等國干預，兼及其他目的，後來廣州、武漢的失守，導致國民政府在外交上處於劣勢，而國民黨願意做出某些讓步好趕快拿到借款等，都是軍事與外交的關係。

吳景平「抗戰時期國統區的財經」

吳教授提到，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統治區的財政金融和經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財政赤字居高不下、法幣通貨膨脹日益嚴重、最發達的東部和沿海地區的主要貿易口岸被佔領、國際運輸線被切斷或遭到禁運、生產力遭到戰火嚴重的破壞。然而國民政府的財政並沒有破產，政府銀行反而加強體系的健全及運作，金融市場秩序總體可控，工業體系的構成基本合理並維持運行，政府徵得的農產品數量逐年增加，交通和郵政電信的業務量明顯提高。這在中國近代經濟變遷的歷程中，雖然不算「黃金時期」，但也足以稱得上是奇蹟。在這奇蹟的背後，不可不提的是國民政府戰時基本的財政、金融和經濟政策。

在稅收政策方面，國民政府透過調整關稅稅率來嚴格控制非抗戰及民生必需物品的進口，並鼓勵急需物品的進口。另一方面，

為了鼓勵出口，凡專門由國營機關統一收購外銷的貨物，以及經規定向國家銀行結售外匯的出口商品，均免徵出口稅；鹽稅方面，改從量計徵為從價計徵，1942年起實施鹽的專賣，以增加鹽稅的收入；提高統稅稅率，稅收總額逐年顯著增加。開徵直接稅方面，主要有印花稅、所得稅、利得稅和遺產稅，並且在抗戰中期把原先為地方稅的營業稅收歸中央政府。

抗戰爆發伊始，國民政府就加強了對貨幣和銀行方面的統制以穩定金融。抗戰時期金融安定在很大程度上是體現於法幣匯價的穩定，為了限制過多的資金流入市場搶購外匯，1938年3月12日國民政府實施外匯請核制度，停止了實施近兩年的無限制買賣外匯的政策。1941年4月，中國政府分別與英、美簽署協定，設立「中英美平準基金」，由於有英、美的支持，故得以維持中國政府發行的法幣的穩定。財政部另設立外匯管理委員會，直接審查政府機關及企業發展的申請用匯，至於私人及商界申請購匯，則授權平準基金會審查。另外，國民政府先後頒令，規定禁止收受行使日元、日本軍用票、偽聯銀券、偽華興券、偽中儲券暨其他性質相同之鈔券。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法幣在上海租界基本上仍占絕對優勢。

在戰時金融體制的確立及其運作過程中，四聯總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抗戰爆發初期國民政府便設立四行的聯合辦事機構，雖然只是一個協調性機構，對中央、中

國、交通、農民各行都不能下達強制性的命令，但它對於統制金融、扶植中央銀行和實施重大經濟政策，仍具有影響力。1939年9月，四聯總處改組為實體性的中中交農四行聯合辦事總處，蔣介石親任理事會主席，通過四聯總處統籌全國金融網之設計分布、紙幣發行調劑、資金集中與運用、發行準備之審核、聯合貼放、內地及口岸匯款之審核、外匯申請之審核、戰時特種生產事業之聯合投資、戰時物資之調劑、收兌金銀之管理、推行特種儲蓄、四行預算決算之復核等。1942年5月起又實行了四行業務劃分和統一發行，中國、交通、農民三行的法幣發行權被中止，中央銀行制度基本確立，其實際運作中如何處理與各政府銀行的關係也有了制度規範。

黃道炫「中共抗戰初期的華北的發展」

黃教授指出，1937年抗戰爆發後，中共迅速向華北出兵，力量迅速擴散至整個華北，而這一決策為中共日後在華北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戰前的華北，國民政府表面上擁有行政權，實際上控制範圍有限，而中日全面開戰後，華北各種政治軍事力量則經歷劇烈的洗牌，以致於華北許多地區呈現權力真空的局面，使得中共進入後得以迅速生根、穩定基礎。抗戰時期中共在各根據地的發展，武裝力量乃絕對要素，統一戰線

和群眾運動則是輔助武力進取的利器。中共與地方實力派構建統一戰線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山西，閻錫山雖保有對山西的控制權，但為了對抗來自南京政府的威脅，閻錫山選擇與中共合作，試圖藉由引入共產黨的力量來抵消南京政府的影響。在一同抵抗日本的目標下，中共武裝力量挺進到山西各個角落，構成日後晉察冀、晉綏、晉冀豫根據地的雛形。

相對於山西的大刀闊斧，中共在冀魯豫地區的發展則是透過小步前進、逐漸累積的方式來拓展勢力範圍。抗戰爆發前，中共在河南的黨員只有百名左右，是冀魯豫三省中共黨力量最弱小的地區。南京政府在戰前可直接控制河南地區，不過地方力量和外來勢力的爭鬥從未止歇。抗戰爆發後，中共在此迅速以群眾運動方式，依靠統一戰線及原有的組織，逐漸壯大，在河南形成以竹溝為中心的抗日武裝根據地，為日後八路軍、新四軍在這一地區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另外，山

東的情形則較特殊，由於山東相距陝甘寧地區較遠，中共武裝力量進入山東較晚，1938年才有八路軍東進縱隊進入山東，是中共地方黨依靠武裝鬥爭獨立建立的武裝力量。由於山東人口多、資源豐富、民間武器多、兵員素質較高，因此中共在山東的發展對其日後的成長具有重要的意義。

抗戰初期的中共，便是在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情況下，藉由武裝的力量及運用統一戰線、群眾運動，逐漸在華北站穩腳跟，奠定日後根據地發展的基礎。這關鍵性的一步，也為最終的國共鬥爭之局，添上了一個重重的砝碼。

本次座談會邀請了各領域學有專精的學者對抗戰時期的中國進行專題演講，藉由此次座談會，期許在史料全面開放、學術研究完全自由、史學人才培育趨於成熟之際，對過去抗戰史的研究課題進行回顧、評述與反省，同時拓展抗戰史研究的規模，期能賦予抗戰史在民國歷史上新的意義和定位。